

Chinese Buddhist Forum

「香港」中華佛教文化院 總編

- 杜繼文教授○訪談錄
周繼旨○論楊仁山與中國近代佛教的復興
釋學誠○僧格的養成與完善
黃寶生○《梵漢佛經對勘叢書》總序
姜南○《法華經》梵漢對勘二題
周廣榮○當真言遭遇王權
宋道發○佛教付法傳統探源
根桑措姆○居士持戒和修行次第
郭文○對人間佛教戒律思想理論建構之思考
止米○佛教文化與國民性格
陳堅○「觀」·中國本土宗教中的方法
平艷○天臺宗在近代上海的弘傳與發展
田平○民國時期南岳的僧伽教育
王亞榮○古絲路佛教的今天
王小盾○五臺山與唐代佛教音樂
李翊○圖像與宗派研究之妙見菩薩尋踪
呂春祥○甘肅卓尼地區藏傳佛教藝術中龍紋圖形的藝術特徵

杜繼文教授○訪談錄

宗風 ZONGFENG



王志遠·主編
庚寅·春之卷

宗教文化出版社 ZF

B948-53

2010.1

2010.1

Chinese Buddhist Forum

宗風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宗風·庚寅春之卷 / 王志遠主編. -北京 :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80254-492-5

I . ①宗… II . ①王… III . ①佛教—文集 IV . ①B948-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2)第022259號

宗 風

庚寅·春之卷

出版發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區後海北沿44號

電 話 :64095215 (發行部) 64095265 (編輯部)

責任編輯 :孟金霞

版式設計 :北京宗風文化傳播中心

北京聖泉宗教文化藝術中心

印 刷 :中煤涿州制圖印刷廠北京分廠

版本紀錄 :889×1194毫米 16開本 21印張 400千字

書 號 :ISBN 978-7-80254-492-5

定 價 :88.00圓

宗 風

ZONG FENG

Chinese Buddhist Forum



Sponsor: Chinese Academy of Buddhist Cultural [Hong Kong]

Contractor: the Center of Zong Feng Chinese Buddhist Forum [Bei jing]

Edition: Zong Feng committee

Advisors: Zhang Guoliang Yang Zhao

Chief editor: Wang Zhiyuan

Assistant editor: Ven. Ben Ru

Vice-chief editors: Zhou Qi Zhou Guangrong

Duty editors: Xie Yonghe Dong Xueliang Gao Min QIYue Wang Yuan

Ink painting: Master Chunkong

Photograph: Zheng Zhai

Designer: Zong Feng Design Center

Layout: the Center of Zong Feng cultural in Beijing

《宗風》是薈萃學術精華的出版物，因此，無論己丑還是庚寅乃至辛卯，年號祇是諸卷的標志和順序，并不是確切的出版日期。我們寧可晚一年，絕不濫一卷，這不是慵懶的遁詞，而是誠懇的宣示。在辛卯歲暮出版的幾卷并不過時的學術大作前面寫下這一段說明，是我們編輯部同仁講給所有讀者的心裏話，也為你們一年來傳遞給我們的對《宗風》的好評和期盼表示感謝，我們爭取在壬辰之年把它編得更好，同時也稍快一些。



卷首語

今年的幾卷《宗風》，有一個要重點圍繞的主題，那就是“百年辛亥，百年佛教”。這是因為，2011年，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了。衆所周知，這一百年來，這個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我們中國，更是經歷了翻天覆地的社會巨變。這個世紀，可以說是在一個世紀裏社會變化頻率和幅度最大的一個歷史時期。在中國從半封建半殖民的那種落後和備受欺辱的令人不堪的近代社會轉向民主和獨立的自主自強的現代社會轉型發展過程中，辛亥革命無疑成為了一個關鍵轉折點和重要標志。在這樣一個紀念日即將到來之時，回顧與反思，毫無疑問是勢在必行的一項具有重要意義的工作。借著這樣一個重要契機，回顧和反思百年來的佛教，對於當今佛教的發展，同樣應該是非常必要和有重要意義的。

本著這樣初衷，這期春季號裏，我們訪談了從事佛教研究幾十年、年逾八旬仍然勤奮工作的杜繼文研究員。其意義不僅在於杜先生是新中國最早專門培養的從事佛教研究的一批學者中的碩老，還在於杜先生是呂澂先生的學生，而呂澂先生是歐陽竟無先生的弟子，歐陽竟無又是近現代佛教復興之父楊仁山居士的門下中堅。這條線索，也是近現代中國佛教和佛學研究發展的一條重要的線索，并且，這條線索本身即展現著不同時期的深刻時代烙印。

這個訪談由清末佛教的衰勢到辛亥革命前後復興之勢的出現說起，因為這其中關係著近現代佛教復興的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在革命思潮和革命行動引領社會發展主流的時候，佛教的社會角色和意義在哪裏的問題。杜先生指出，雖然那個時期“寺院佛教”急劇衰落，但是“教義佛教”則恰恰相反，是呈現上升勢頭的。引領近世變革的領軍人物中，很多人都試圖由佛教中尋求思想資源。不僅有楊仁山那樣希望用佛教凝聚東方文化來應對西方的文化強勢的願望，更有章太炎、譚嗣同和梁啟超等文化先驅、革命先驅，用佛教“依自不依他”等教義和大無畏犧牲精神等，來參與喚起主體自覺精神和民族振興精神。杜先生認為教義佛教在那個重要轉折時期起到了積極作用，而且也是使得一些知識分子重視佛教研究並同時積極參與變革的一個重要原因。

的確，評價思想家的歷史作用，應該把它放在時代的大背景下、放在其所處的民族文化傳統的歷史長河中來觀察，中國哲學史研究大家周繼旨先生關於《楊仁山與近現代佛教的復興》的文章，即是由溯源而順流的方式，將既親歷了晚清社會劇烈動蕩、又曾前往西方考察多年的楊仁山居士的思想流變，放在中國思想文化流變的大系統和時代大課題的高度上審視，讓楊仁山居士看似個人的宗教選擇和弘揚佛教的作為繼而發展成為引領佛教發展時代潮流的偉大事業的脈絡和意義，在一個既縱深又寬廣的背景下，得到了自然地彰顯。

這個訪談和這篇文章，是我們刻意組合的。所為用心和目的，完全不是要標榜權威，而是希望引起佛教界和更多的研究者對於近百年佛教研究的重視和更加深入地發掘近現代以來的這場佛教復興的寶貴價值和深遠意義。

不同於清朝中晚期佛教自身力量的沉落，民國至今推動佛教復興的大趨勢裏，出家僧人是首當其衝的中堅力量。學誠法師的文章，就是紀念弘一大師的，并通過紀念弘一大師的事迹和境界，提出了一套當今環境下如何修養僧格的理論。文章從樹立理念內涵和落實行動兩個方面，詳細說明了其“僧格的養成與完善”的具體觀點。回顧“百年佛教”尤其應該重視“反思”的意義，這篇文章就是一個好的典範，透露著對於佛教發展深切的現實關懷。

本期有幾篇相關佛教梵文經典研究的文章，也很值得重視。《法華經》是流行最廣的佛經之一，但千百年來並沒多少人追究它的翻譯問題。姜南《〈法華經〉梵漢對勘二題》，就是個踏實而深入的探索。周廣榮《當真言遭遇王權》一文探究佛教傳播過程中真言與王權的關係，與其說是研究角度好，莫若說也是對千百年來熟視但無睹的問題的正視，不僅有問題意識，更體現研究實力。本刊前後還發表了其他幾篇相關梵文的文章，令人十分可喜地見到相關領域的壯大！

事實上，自楊仁山居士至民國的佛教復興趨勢中，梵文經典和印度佛教研究是其中佛學研究的一個重點內容。或許當初有的是出於佛教的根源性追求的目的，還可能是有凝聚中印文化為東方文化而應對西方文化強勢的目的等等。那時的佛教梵文經典研究和今天的相關研究有怎樣的關聯性或者有什麼不同呢？通過當代梵文研究權威黃寶生先生《〈梵漢佛經對勘叢書〉總序》一文，大家既可以系統了解這項學術工作的價值，或許還可以由此而伸展開來，去回顧和審視一下近百年來相關研究對於佛教發展的意義。

佛學研究中類似梵文經典研究等比較艱深的研究工作，多數情況下都是曲高和寡的局面，但是，却始終有人投入其中，且不時掀起一些高潮，晚近民國以來就曾有過不小的熱潮，使得這方面的探討得以延續。可喜的是，在黃寶生先生等一批學者的共同努力下，近來佛教梵典研究又有了起色，並且還有不少年輕人能够耐得寂寞加入其中。如果用個比喻來形容佛教中這類深奧學問的研究，那就是像保證航船穩定而能抵禦風浪的“壓倉石”。你們是否同意我的這種比喻呢？如果同意，那麼，我們大家就對那些有“壓倉石”意義的深沉的佛學研究多投入一些關注吧！

這一卷可推薦的文章不少，限於篇幅，不能贅述了。還是請大家閱讀，多多指正為上。



CONTENTS

Preface of Chief Editor

Interviews

- 002 **Wang Song**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Du Jiwen

Scholastic Perspectives from External Buddhist World

- 034 **Zhou Jizhi** On the layman Yang Renshan and the revival of Buddhism in modern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thought

Humanistic Buddhism in the Mundane World

- 064 **Ven. Xuecheng** The formation and perfection of monk personality—celebrating the 13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Master Hong Yi
084 **Guo Wen** On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precepts in humanistic Buddhism—take the confucianization of Buddhist precept as an angle of view
096 **He Zhimi** Buddhism culture and national personality—on the impact of Buddhism on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personality

History of Buddhist Schools

- 106 **Song Daofa** The origin of Buddhist dharma transmission tradition
120 **Hou Huiming** On the conjuring of the early Buddhism
134 **Jiang Nan** Two comparisons of Sanskrit and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Lotus Sutra
148 **Gensangcuomu** Layman taking precepts and the sequence of practicing Buddhism

Buddhism and Social Trends

- 182 **Zhou Guangrong** When mantras encounter monarchical power
196 **Chen Jian** Contemplations, the method of Chinese religions
210 **Wu Ping** The spreading and development of Tiantai sect in modern Shanghai
220 **Tian Yan** Monastic education of Nanyue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uddhism in Social Context

- 234 **Wang Yaro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ncient silk road Buddhism, observed in the survey in Xian and Tianshui
242 **Xu Wenwu** On the spreading of Buddhism in Jingzhou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254 **Huang Baosheng** The preface of book series on the Sanskrit-Chines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Buddhist texts
262 **Gao Shanshan** Five types of miscellaneous talk about Buddhist texts

Splendid Buddhist Arts

- 276 **Wang Xiaodun** Wutai Mountain and Buddhist music in Tang dynasty
292 **Li Ling** A Study of Bodhisattva Miao Jian by Images and Schools
308 **Lu Chunxiang** The artistic feature of dragon pattern in Tibetan Buddhism art in Choni, Gansu province



宗風

主辦 [香港] 中華佛教文化院
承辦 北京宗風文化傳播中心
編輯 《宗風》編輯委員會
顧問 張國良 楊劍
主編 王志遠
主編助理 釋本如
副主編 周齊 周廣榮
責任編委 謝咏禾 董學良 高民 齊玥 王瑗

整體設計 北京宗風文化傳播中心
版式設計 北京聖泉宗教文化藝術中心
攝影 正齊 (署名者除外)

理事長 楊劍
副理事長 謝咏禾 陳義和 李傑
常務理事 董學良 張永保 高民
理事 王櫟硯 齊玥 王瑗
秘書長 王志遠
副秘書長 洪麗孟
理事會地址 香港九龍灣宏遠街1號 “一號九龍” 41樓
中華佛教文化院 (852) 2263 3580
北京工作室 北京建國門內大街5號8樓841室 (100732)
郵箱 zongfengzazhi@126.com
電話 010-85195475

禪畫 本卷全部插圖特約純空法師創作
(署名者除外)



近代佛教復興之父楊文會居士肖像



目錄

卷首語

宗風訪談

002 編輯整理 王頌 杜繼文教授訪談錄

檻外書香

034 周繼旨 論楊仁山與中國近代佛教的復興

——兼及中國佛教思想發展史之背景

人本人間

064 釋學誠 僧格的養成與完善

——紀念弘一大師誕辰一百三十周年

084 郭文 對“人間佛教”戒律思想理論建構之思考

——以“佛教戒律的儒家化”為視角

096 何止米 佛教文化與國民性格

——論佛教對國民性格形成的影響

世潮佛舟

182 周廣榮 當真言遭遇王權

196 陳堅 “觀”：中國本土宗教中的方法

210 吳平 天臺宗在近代上海的弘傳與發展

220 田艷 民國時期南岳的僧伽教育

如來家業

234 王亞榮 古絲路佛教的今天：西安一天水調研所見

242 徐文武 論隋唐時期佛教在荊州的傳播

254 黃寶生 《梵漢佛經對勘叢書》總序

262 高山杉 佛書雜談五種

英華彌縛

276 王小盾 五臺山與唐代佛教音樂

292 李翎 圖像與宗派研究之妙見菩薩尋踪

308 吕春祥 甘肅卓尼地區藏傳佛教藝術中龍紋圖形
的藝術特徵

宗門溯源

106 宋道發 佛教付法傳統探源

120 侯慧明 論佛教早期的咒術

134 姜南 《法華經》梵漢對勘二題

148 根桑措姆 居士持戒和修行次第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Du Jiwen

杜繼文教授訪談錄

編輯整理 王頌



(左至右：周齊教授、杜繼文教授、王志遠教授)

地點：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采訪人：鳳凰衛視記者 施純志

編輯整理：北京大學副教授 王頌

訪談對象：杜繼文教授（以下簡稱杜教授）

杜繼文，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世界宗教研究所前所長，著名佛學泰斗呂澂先生親授弟子、資深研究員、當代佛學家。1930年5月30日出生於山東青島嶗山，195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61年隨呂澂先生研習佛學。

一、在“五四運動”所有的批判裏面，唯一幸免的就是佛教。

——關於晚清以來的中國佛教

記者：到了清朝，中國佛教已極度衰微；但在辛亥革命前後，中國却涌現出一大批高僧大德，佛教出現復興勢頭。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到底是

什麼原因促成的？這個現象在中國佛教史上有什麼意義？

杜教授：清朝末年寺院佛教普遍地急劇衰落，這個衰落與當時國家貧困落後有關係，但是作為教義的佛教來講，恰恰相反，是個上升的勢頭，這段歷史恐怕是中國佛教很重要的一個環節，那就是緩慢地走向復興。力爭復興的原因與中國當時所處的一種被侵略的地位有關係。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西方的文化是強勢文化，對我們這樣一個民族的壓迫是很厲害的，因此醞釀的反抗也很厲害。其實當時東方幾乎所有的民族都遇到這個問題。西方強勢文化對中國，甚至於對印度，包括對日本都是一種壓力，於是作為對抗西方侵略的一種文化形態，在東方就出現了佛教復興運動。這個佛教復興運動大概以斯里蘭卡、日本、中國為代表，斯里蘭卡代表南傳佛教，日本、中國代表北傳佛教，聯合在一起，期望復興古代印度佛教鼎盛時期的那種態勢，特別用來抵制基督教的文化侵略。這個勢頭大約從維新變法以前就開始醞釀了。

這是一個歷史大趨勢，在中國的一個代表人物就是楊文會先生，他來參與這個運動，一直影響到百年以後。為什麼楊文會先生這個傳承系統提倡印度佛教？與這個時代大背景有關係。他是把東方文化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的。但是就中國來講，儒家的倫理觀念，它的政治倫理、家庭倫理處在一種危機的狀態，不能夠應對西方的強勢，包括在政治上、經濟上以及文化上的一種優勢。所以當時變革之風很強，變革的時候，就要吸收一種文化的力量、思想的力量，當時有兩個可能的途徑，其中一種是向西方學習，另外一種就是總結中國的歷史，從中國的歷史中吸取力量，當時吸收的對象不是儒教，而是佛教。

佛教復興的國際國內原因，大概就是這樣。

在這個方面，我要特別強調寺院的佛教同教義的佛教之差別。寺院佛教在發展過程裏面，碰到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中國在辦新教、新學。搞新學，就是我們現在仍然保持的那種西方的教育體制，幾年制的那種。其中有一個困難就是沒錢、沒老師、沒房子，特別是沒房子，缺硬件。怎麼辦呢？大概從張之洞開始提出來，要把祠堂，老百姓供祖宗的祠堂，把道觀，把寺院，沒收一部分，拿出來辦學。這就是所謂“廟產興學”，這對佛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打擊，但按維新派的說法，國家要由積弱變强大，國民必須具備足夠的智力，而提高智力的途徑，非教育莫屬。宗教為教育讓路，當時大概是得到全民支持的。

與此同時，在教義上的佛教却非常突出，有許多佛教徒都參加了當時的維新，或者辛亥革命的活動。其中最有名的代表人物，譚嗣同是一個，他以殺身喚醒國人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受佛教的影響。康有為、梁啟超都受西方宗教改革的影響，到後期都提出宗教救世的主張，前者創建立了“孔教會”；

梁啟超則看好佛教。在他們向往的“大同世界”中，更增添了涅槃四德“常樂我淨”的理想。辛亥革命那一派裏面，領軍人物之一章太炎先生，在思想上也主張要搞中國的宗教。他有一篇文章很有名，叫《建立宗教論》，他建立的那個宗教是無神的宗教，就是佛教。同時他還有一篇文章叫《無神論》，就是反對基督教那類一神教，認為那樣的“神”是用外力強加給人的，他不贊成。

所以說，佛教在這樣一個歷史轉折過程中，在教義這方面，它關注了中國，參與了戊戌變法，參與了辛亥革命，起到這麼一個歷史的作用。在這個作用帶動下，就涌現出了一大批知識分子研究佛教，一直到目前。也就是在辛亥革命這個偉大歷史轉折的時期，中國人重新認識了佛教的價值。

記者：是的，在甲午戰爭之後，中國知識分子似乎想從佛教尋求資源，來響應西方文化對中國的衝擊。一部分人覺得佛教的思想，是可以跟西方很嚴密的哲學體系抗衡的。另外他們看到日本當時信佛教，所以他們國家强大起來，就像康有為、梁啟超，還有譚嗣同，他們就想從佛教思想中找一些資源，來響應西方的挑戰，但是一段時間以後就失敗了，這是為什麼？

杜教授：這就要知道當時他們想從佛教裏面吸收什麼，他們吸收的不是偶像崇拜，簡單講，章太炎有一句話，就是“依自不依他”，就是依靠自己，不依靠其他的外力。換句話說，我們自己的民族要強盛，要依靠自己，自己的人民，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外力上，既不能寄希望於外國，也不能寄幻想於神靈。此即謂之“自強”，自己要爭氣，自己要站起來——“自強”是當時最先進的思想，類似的口號，大家很熟悉，就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是這個最核心的觀念，把中國的民族自尊和人的主觀精神、集體精神，突出出來了。當時鼓起了相當一部分青年人的革命熱情。當然了，他的宗教學說也有很大影響，比如因果報應這方面，就是“老子死了也不怕，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不怕死，成為一種民族精神，不怕犧牲的一種精神，“集體精神”和“不怕犧牲”這兩者結合起來以後，就把人心凝聚起來了，而且就有一種大無畏的戰鬥精神。在當時來講，我們國家那麼懦弱、那麼萎靡，人心那麼散，它起了一個鼓舞士氣、鼓舞民氣的作用。

但是以後大家都知道了，僅僅是熱情還不够，因為精神上的支柱，必須轉化成物質的力量，你才能够實現你的目標，所以當時大家向往的就是西方的科學。所以它兩個是互相交融的，就是向西方學習物質文明，同時發揚中國的精神文明。所謂精神文明，嚴格講不是儒教，而是佛教的那種民族的集體精神，要發揚這個東西。“五四運動”以後，佛教穩定下來了，寺院問題基本上解決了，廟產問題基本上也解決了，當然沒完全解決，但是在它的理論上，

可以講站住脚了。

過去好多人認為佛教是迷信，現在發現它是非常有理論體系的、有思想高度的，而且充滿了有助於提升民族精神的因素。所以佛學在近代以來的發展是平穩的。在“五四運動”所有的批判裏面，儒家的禮教是最普遍的一個靶子，都是針對它的家庭倫理和政治倫理。但是最少受到批評的，或者說簡直沒遇到過批評的就是佛教。任何一個思想家都沒有批判佛教的教義的，祇是批評過佛教的偶像崇拜的那部分，對這一點的批評，不僅來自教外，也來自教內。在學術研究中，要把佛學理論同偶像崇拜區別開來。

二、佛教把教義與中國的人本主義思想非常密切地結合在一起。 ——關於佛教與現實社會的關係問題

記者：佛教在很多人看來是消極的，對現實採取逃避的態度，這是不是一般人的誤解？在辛亥革命之前，像宗仰法師^[1]，他就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他當時也很活躍，我們怎麼看佛教界的人士參與現實的政治活動？

杜教授：佛教傳入中國之後有很大很大的變化。譬如說，為什麼在印度的佛教最終消亡了？我覺得有兩個原因，其中一個原因是它的組織能力很差，組織很鬆散，沒有很强的集權式的所謂大一統的組織方式。

但是最重要的另一個原因，就在於他反對一神教，反對神創論。他倡導“人創論”，反對“神創論”。所謂“人創論”，就是一切都是由人的思想行為來決定的，不是由哪一個神來替我們決定的。主要是這個原因。同時佛教在印度還有一個待不下去的原因，就是教義裏面，特別是原始佛教部分裏面，悲觀的程度、消極的成分太重，這個悲觀，消極，比如“觀身不淨”這個概念強調太多，就把人看成了很醜陋的一個東西，很臟的一個東西。但是到了中國以後，它就有很大很大的轉變，非常大的轉變，這個轉變從翻譯佛教經典開始就出現了，人不再是骯髒的，而是在輪回裏面，在五道輪回裏面，在六道輪回裏面。最有價值的是人，所以叫“人身難得”，就是說，人之成為一個人是很難的。所以從佛教教義講，就是天神都成不了佛，祇有人才能成佛。所以佛教是把教義與中國的人本主義思想非常密切地結合在一起了。

中國本來是一個人本主義的國家，這樣一講“人”，就有兩條必須得承認。

第一，人本身應該受到尊重；第二，生育孩子是人的本能，是人的天性，人的責任，必須要生人，不能把人消滅掉。因為在印度，原始佛教的思想很悲觀，強調無常，應該講，對人的生命是一種鄙視的態度。在中國非常重視“菩



薩”這個概念，菩薩太重要了，當然也是外來的，但是突出強調“菩薩”概念，是在中國。

在我們中國有兩位菩薩是很有名的，可能現在大家不是很清楚了，因為現在的寺院裏面大多沒有他們的形象，可是在教義裏面這兩位菩薩很重要。一位是維摩詰。南北朝時期，每個名士都有這麼三本書：《老子》、《論語》、《維摩詰經》，非常重要的。維摩詰是個什麼人？他就是在家的菩薩。他是大富翁，非常有錢，但是他會說法，把佛陀的十個大弟子全部都給駁倒了，他們全都不行。這是第一位。

我們還有一位。叫勝鬘夫人，勝鬘是一個結過婚的女人，一個王者的夫人，她也講法，她講法的氣度也是很大，她能代替佛陀來講法，所以她的法相當於佛法，在中國也是一大派。大家知道，以後出現一個叫“如來藏緣起”的派別，就是從她這個地方來的。

這樣的話，中國的居士不僅是在家，生孩子，有父母，有一個大家庭，有的是大富翁，有的還是王者，而且他還可以講法，他的法比出家人講得還好，這一下子就把人的地位提高了，把人生無常的這個意識就給壓下去了。當然并不是沒有，但是把它壓下去了，占主流的是這種狀況。所以在中國以後有許多的經典講孝道，換句話說基本上把印度佛教、原始佛教的那一種教義中對人的鞭笞幾乎全部給改變了。所以最終佛教以中國為中心，一下子發展到亞洲的這麼一個大的範圍，與思想改變有關係。

國家，國家，國與家一體，孝與忠相連，這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根深蒂固。菩薩衝破了必須出家的限制，由單一的利己轉變為更重利人，所以國家觀念，愛國情懷也就成為中國佛教的一大特色，自兩宋以來，尤為顯著。你所講的宗仰法師，當是近代最優秀的代表之一。他代表的是一個方向，也是中國佛教的一種精神。在大乘教義中有充分的根據。

記者：像我們中國的佛教強調現世，強調人生，會不會背離了佛教的宗旨？

杜教授：這就要看是哪種佛教。佛教是一個通名，它跟一神教是絕對不一樣的。一神教我們知道，它祇念一本經，用一本經統一它古今各地的所有教徒，儘管它的神學千差萬別。現在我來講佛教，它就不祇是一本經，經律論三藏有幾千種，如果把《阿含》的小經算上，可能上萬。其中任一本都可以成為經典，都可以拿出來成為一個派別，沒有人反對，反對也沒有用。為什麼呢，因為它是在不斷地發展變化著，它的思想結構和信仰內涵多種多樣，更缺乏嚴密的統一的組織。它完全適應社會的需要，適應社會不同階層來演化的，所以南傳佛教和北傳佛教，漢傳佛教跟藏傳佛教，以及日本佛教跟中

國佛教，如此等等差別非常之大。即使在同一個國度、同一個時代，甚或信奉同一本經書，就各有各的讀法，各有各的詮釋，形成不同的派別。所以沒有說哪個是最正統的佛教，哪個不是正統佛教，祇要有人相信，那就是佛教。所以有像《四十二章經》那樣的祇管個人解脫的派別，也有像大乘菩薩行那樣關切他人生存狀況、關心國家命運的佛教思想家。其實把愛國情懷納入佛教範疇的，在東方國家很普遍。

三、佛教真要發達起來，首先要 在教義上適應現在這個時代。 ——關於進入現代社會佛教面臨的挑戰問題

記者：佛教在歷史上遇到過好多次法難，最有名就是“三武一宗”，據說佛教真正面臨的法難，是在近代西方文化科技進入中國之後，佛教受到非常大的挑戰。佛教到底遇到了什麼挑戰？它怎麼來回應的？

杜教授：佛教之所以發達，從近代史來講，不是從寺院裏面發達起來的，不是從寺院佛教發展起來的，而是從教義佛教發展起來的。

據我的了解，至少是 19 世紀，還要更早，甚至 18 世紀還要以前，中國佛教就傳到西方去了，但是並非寺院佛教，而是以教義佛教的形式傳過去的。我們知道，西方有許多哲學家的思想，我們不能說他是直接受佛教的影響，但是他好多思想派別跟佛教非常之接近，比如康德哲學——包括新康德主義，同佛教唯識學派在大的體系上就很近似。在德國的康德之前，英國的貝克萊，特別是休謨，認為認識祇能限制在自己的感覺範圍，即認識對象的範圍（表象），那麼，在這一基本點上，也與唯識學，尤其是與玄奘所傳的法相唯識學相似。至於後起的德國人叔本華，更以《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為他的著作名稱，更像是佛教唯識學的論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派設想的“潛意識”（無意識）理論，我們從唯識學派提出的第八、第七識裏面就能找出許多近似點來，到了榮格更直接引進了佛教觀念，尤其是藏傳佛教的。

佛教教義對德國哲學的影響其實是值得著重研究的，儘管我們還不清楚他們是通過什麼管道了解佛教的。黑格爾在他的《哲學史演講錄中》就有了佛教哲學的地位；在他的《邏輯學》中佛教的“無”則成了他的邏輯發展中繼“有”之後的另一個重要環節。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辯證法》草案中說，“辯證思維”祇有“對較高發展階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臘人）才是可能的”——恩格斯所謂的“辯證思維”，指的是“以對概念本性的研究為前提”的思維，而直到今天，我們在佛教研究領域也很少或根本沒有接觸到“概念的本性”問題。

非常慚愧。

至於近現代西方哲學潮流，我們可以碰到許多康德主義與佛教教義相混合的派別，像一度在國內流行的存在主義，特別是法國人薩特的無神論存在主義。所謂“存在先於本質”，即：每個人自己塑造自己的形象。幾乎接觸到佛教哲學的核心。

為什麼佛教教義會在文藝復興、啓蒙運動以後的西方產生共鳴，產生影響？我在夏威夷碰到一個年輕人，是個美國人，他是來參加一個佛教學術會議的。我當時覺得挺奇怪的，我說你怎麼也來參加？（意指他的基督教文化背景）他講得非常單純，非常簡單。他說，誰造人？自己，這就是佛教。換言之，佛教能夠適應西方人本主義的覺醒和個性的張揚。

總而言之，佛教真要發達起來，我以為首先要教義上，適應我們現在這個時代，可是現在我們對教義的發掘和研究方面，根據我對現存《大藏經》的印象知道，還遠遠沒超過支那內學院，這是一個很大的遺憾。另外一方面，就以現在的狀況來講，我個人的看法，講信仰，當然在寺院佛教，但是講理論，講教義，我認為寺院佛教還達不到現在文化界的這個水平，這個跟過去很不一樣。大家知道從兩晉南北朝開始，特別是到了隋唐五代，文化中心是在寺院裏面，最高哲學在寺院裏面；至少就這個歷史階段講，離開源自寺院的佛教哲學，中國哲學史將是一片空白。現在我們達不到這個程度，我覺得這得思考。所以危機不在於外面給你多大的挑戰，而是你怎麼來應對挑戰。比如第一件，怎麼來解決有些人對信仰的要求，他就是要找個地方去磕頭、許願，你能不能夠少要錢，或者不要錢？滿足平頭百姓的需要。

第二個問題，能不能下點本錢，自己培養一些研究教義的理論人才？我看好像我國臺灣這方面比大陸還重視，最近他們在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剛畢業了兩位比丘尼博士生，我看她們的畢業論文的水平，比我們的某些研究生寫得還好，人家也是從信仰層面來談的，雖然思路比較窄，但很深入，大陸學生很難做得到。比較起來，我覺得大陸的有些學生顯得太浮躁了。有時候說起這些事來，恐怕教界不大高興，我們也不好插手，因為信仰的事情是他們的事情。但是作為一種文化的載體，我覺得也應該講一講。

四、佛教的改革在舊社會根本不可能成功，與當時的貧困有關係。 ——關於民國時期的佛教改革問題

記者：太虛大師提出建立佛教現代化，提出新的改革，您怎麼評論太虛